

# 青年的历史存在

■ 谢昌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在人类诞生时期由于脑容量逐步增加延长了成长期,通常,童年的真情与青春的品质融入成年社会成为进化的动力被称为青春化。父权制产生后青年成为被压制的对象,形成了代际冲突。在父权出现分散并有了约束权力的民主制条件下,青年有了发展的空间并以思想的接力使自己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现代化面临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时,青年又奉行新的价值观,希望创建新世界。因此青年的历史存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青年 历史存在 青春化 父权制 新价值观

在地球上所有的存在物中,人的存在是最独特的,总是力求创造新的存在,不断展示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人的进化发展过程。在人的历史存在中,青年的历史存在又是如何呢?提倡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和在青年中发现历史的田杰教授写道:“在以往的青年研究中,对于青年是否属于一种历史的存在,或青年是否是历史地存在着的,以及这种历史究竟可以追溯到离人类文明进程的源头有多远,人们的看法一直有着较大的分歧。具体说,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是否有青年存在,二是古代社会(甚至可以包括远古神话传说时代)的‘年轻人’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以及青年研究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sup>[1]</sup>

## 一、人类诞生中的青春化

通过对青年在远古时期历史的考察,法国社会学家莫兰认为,人类和文化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和普遍理论意义的问题。莫兰在生态学、动物行为学、生物-社会学等启示下,将英国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利基的考古发现与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联系起来,将类人猿和原人、原人和现代人联结起来进行研究,人类诞生中的“青春化”是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理查德·利基指出,在距今300万-200万年之间发展出脑明显增大的一个物种,是人属出现的信号。当脑容量逐步增加,胎儿没有成熟也必须提前出生,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收稿日期:2016-02-10

作者简介:谢昌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室原主任,中国青年社会学学会原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主要研究青少年理论。

是初生儿要经历一段较长的儿童期和青年期,在动物界中唯独人类才有这种现象<sup>[2]</sup>。这个生命界独一无二的青春期在人类的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莫兰的研究从类人猿群体开始,其社会内部成年雄性、雌性和未成年个体之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由合作-团结和竞争-对立的双重原则支配着。母子的亲和性表现为青少年生活中的友谊,青年猴受到特权集团的排斥处在低下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在游戏、探索时有创新。原始文化的突现就与青年猴有关。九州岛上生活在森林边的一群猕猴原来是用手将挖出的块根食物擦干净,一个青年猴偶然将块根掉在海边,拿回来发现不仅被海水洗净而且带来了咸味。对此,老年猴不予理睬,青年猴争相仿效,在下一代传播开来并延续到成年,一个随机的事件就成为变化的源泉。“我们可以看到好奇的猴喜玩耍、好探索,虽然它们地位卑微,处于社会边缘,但是它们的存在构成了整个社会开放的边界,变化的因素通过这里发生。”<sup>[3]</sup>莫兰将它视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创新和传播的前史。第三世纪末期,地球的干旱缩小了森林面积,扩大了草原面积,初生牛犊不怕虎,人口压力已将未成年猴排挤到森林边缘,好奇心驱使它们冒险走向了草原。“因此看起来是不正常者、被抛弃者、‘无国籍者’、探险者、反叛者成为原人革命的先锋。”<sup>[4]</sup>草原的新环境启动了直立行走,脑-手-脚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促进了狩猎技术和其他进步,导致了头脑发达的原人的胜利。

原人向智人进化的时期是脑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因此原人的青年期大大超过了类人猿,这成了原人进化的关键。“比年轻的类人猿存在时间更长的年轻的原人游戏、探索、被新鲜事物吸引。在吸收成年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对之加以修改、完善和创新……这样,青年人的半社会化,他们和成年人的关系,使得社会有可能直接享受创新和发明之利。此外,青少年的特点如爱好、好玩、求新,甚至发明的能力也愈益维持到成年人的年纪;青春化变成了一个人类学现象。青年人被‘融合’、‘回收’,而他们的在类人猿社会里处于边缘地位的品质现在却浇灌着原人社会。”<sup>[5]</sup>可见,青年在原始人进化中的作用可以从当时的年龄结构寿命不长得到证明,还可以在各民族的神话中几乎都是健壮、聪颖、俊美的青年男女形象得到证实,青年崇拜说明了青年在人类早期的价值。

从类人猿进化到人是宇宙的奇迹,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人性的生成,特别是有智慧的人脑的诞生,尽管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空间有待继续探索。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是人类的诞生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自然的人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自然界也就出现了由人类的创造活动加以改进过的自然界,即人的世界;二是人自身的自然性越来越人性化,一般指感官的变化,如眼睛变成审美的眼睛,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而人脑的出现则更成为热烈的话题。参与发现“北京猿人”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论述人类出现反省意识时指出:“这个升华的伟大过程,可以用‘人化’(hominization)一词称之。‘人化’可以用以称呼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顿跃,但也可以广泛地指称在人类文明中从动物世界转入精神世界的过程。”<sup>[6]</sup>他在论述人是否比动物更高级的问题时写道:“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彻底扫除关于人类行为的那些次要、蒙混的内在表现,而单刀直入去探讨中心的现象——反省。”<sup>[7]</sup>

反省就是自我意识,是在实现目的的活动中,主体对客体已有认识的再认识,主体也成为认识的对象,设计出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形成创造未来的能力。人不仅创造了人的世界,而且创造了人自己,由自我意识形成的创造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埃克尔斯在其所著的书中引用多布赞斯基对人类自我意识的不同寻常的萌芽这样表述:“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sup>[8]</sup>;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著的《人论》一书第一句就写道:“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sup>[9]</sup>哲学、人类学等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本质

特征就在于具有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

这两方面的人化都与青年有着密切关系,青春化就曾参与了人类劳动改造自然,而人内在自然的人化则主要是在青春期实现的。作为生物物质的脑,其潜能需要后天的开发,认知心理学表明,在与外界发生接触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婴儿随着生理的发育,在成长过程中,不同年龄的认知能力也分为不同阶段,由量变到质变,经过近二十年时间自我意识成熟,这是脑的人化,是人内在自然人化的核心。在内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吸纳祖辈留下的社会文化硕果越丰富,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强大,潜能也发挥得越充分,青年的自然和天性中因此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对面向未来的青年来说,作为人的最根本特征自我意识的成熟对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是青春期的关键问题。“主我-客我的分化是人生进入青年期的根本标志,也是所有青年现象世界的内在动力机制。因此,它是青年的人的本质的核心所在。”<sup>[10]</sup>

## 二、父权制下的青年

青春化的作用在父权制的统治下有了根本改变,父权制替代母权制,一部分男性脱离生产,专职政治、军事、文化事业。各民族都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建功立业是由蒙昧时代向文明的转变,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统治者不仅贬低了妇女的地位,而且将穷人、奴隶当作工具,各部落之间把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战争当成了经常性的事业。以压制、暴力维持统治的成年人,“压抑”他们自己曾经浸润过的妇女文化和青少年文化,改变了原有的人性,而且以极其野蛮的成年仪式控制青年,造就勇敢的战士。青年从此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等级而存在,代际冲突替代了青春化。

年龄结构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使希腊青年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公民,斯巴达的青年就不同。古罗马以武力建国扩大疆土,初期的国王就曾进行人口普查,认为青年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人群。中国皇朝为了使家天下永远稳固,必定要严加控制,更不允许青年的反叛。从汉朝独尊儒术制定三纲六纪开始,历代皇朝都将君臣关系饰成父子关系,使专制王国的严格等级制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形成垂直式的统治直达庶民,父子的亲情关系被政治化成了等级关系。宗法人伦像枷锁钳在男女青年的心中,造成了一个又一个青年爱情与婚姻的悲剧,《红楼梦》是反映代际冲突的经典之作,贾宝玉、林黛玉希望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去爱,去争,去生活;而贾政、王夫人等却不让他们成为自己,要他们成为孝子贤孙,规规矩矩,为荣华富贵而奔波辛苦。这就是贾政与宝玉“父与子”的冲突,最终以贾宝玉的悲剧而告终。

在欧洲的中世纪,骑士要举行从7-20岁长时期的严格效忠仪式,广大农村的孩子更是没有自我。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在古罗马灭亡以后分成了众多国家,加上教会统治,权力分散;文化也分为古希腊和罗马、基督教、日耳曼战士这三种并存并相互影响的格局,特别是教皇与国王两种权力既争斗又协作,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未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都是有影响的。青年的自然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权力的分散为青年的历史出场提供了空间。原来依附于家庭中的青年,由于修道院推动农业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勇敢的青年冒险走出经商,摆脱了效忠、服从的身份,成了促进城镇化的力量。从11世纪开始了争取城镇特权的斗争,从国王、领主和主教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这就吸引了更多青年从农村进城发展,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与封闭状态,扩大了商务往来,在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下形成了一群社会新贵,被称为“市民阶级”,与僧侣和贵族形成三足鼎立,宗教、国家政权和市场经济各有其独立的领域。

工商业与城镇的发展要求提高人的素质,它促进了青年的求知欲望。整个12世纪,在欧

洲,远离故乡长途跋涉投奔著名教师的青年成千上万,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求学潮。最早的大学就是由学生聚集在教师周围自然形成的。学生除了听讲还兴起了自由讨论课,内容涉及各种宗教或政治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非教士阶层,在商人与教会、君王分权之后,又增加了大学中的新兴社会力量。

中国也曾有过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动乱的暂时分权,形成文化繁荣,为青年提供了上升的空间。以青年领军人物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思想曾被誉为是中国的思想启蒙,在清兵入关时夭折,青年仍然处在长期延续的父权统治之中。即便是在欧洲,“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sup>[11]</sup>欧洲国王和教会的统治也曾经极其专制,战争成为痼疾,教皇设置异端裁判所烧死异端分子。对于谁都冲不破的中国宗法人伦罗网,杨适教授称“这是一个窒息着几乎一切人自主发展的社会文化形态,其异化是非常细致深刻的”<sup>[12]</sup>。但是杨适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它的历史功绩。中国历代王朝创建的业绩确曾举世瞩目,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异化的反抗从未停止并形成王权循环的历史。欧洲则由于存在相互制约的多元力量,1215年就出现了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大宪章》;到了17世纪英国革命时,保皇派的菲尔麦还将君权与父权混为一谈,演绎成君权神授的理论主张复辟专制主义。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驳斥君权神授学说,提出三权分立实行宪政的理论。洛克可能不了解中国“以孝治天下”的历史,《政府论》用大量篇幅详细批判了将君权与父权结合的专制主义,他认为,父亲只是天生有教养和保护子女的权力,是一种亲情。“父权固然是一种自然的统治,但决不能扩展到政治方面的目的和管理范围。”<sup>[13]</sup>洛克对父权的分析是关于代际关系的重要理论。父权体制将父权与专制相结合,是对青年的控制,将父权还原为亲情,是对青年的解放。青年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一种标志,是由代际冲突走向和谐、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

### 三、伟大思想的接力

青年摆脱了依附性身份成为新兴阶层,过着辛勤活跃而又闲适娱乐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处在封建旧制度环境的包围之中,战争频繁、腐败横行、民不聊生。青年以顽强生命力所催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肯定要突破环境的压力成长为大树。比较有利的是,“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sup>[14]</sup> 布克哈特因此说,它称得上是第一个近代国家,陈衡哲也说,佛罗伦萨是第二个雅典。正是在佛罗伦萨青年中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巨人。

作为中古文化先锋的但丁,青年时的日记片段记录了他成为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在但丁身边长大的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之父,但史学家认为其不朽之处仍在于他少年写下的抒情诗。写下《十日谈》的薄伽丘视彼特拉克为良师益友,崇拜彼特拉克的萨鲁培蒂当上佛罗伦萨总理后,招收一批年轻人发展彼特拉克传统,其中的穷学生布鲁尼撰写的佛罗伦萨历史成为史学的里程碑。还有儿童时代就出人头地、24岁研究物理学、数学的建筑师里昂·巴蒂斯塔·亚尔培蒂,14岁开始学画、20岁就取得很高造诣被称为巨人中的巨人的画家、科学家达·芬奇……他们的绘画不再以肉体为罪恶的根源,而是提升了人的价值,人的形象和身体成为关注的中心,青春和生命的主题在文艺复兴中光芒四射。

接着,针对教会的日益专制与腐败,由伊拉斯谟、深受伊拉斯谟影响的马丁·路德、青年领袖加尔文相继发动宗教革命,进一步将人文主义影响扩展到每个家庭、每个民族,人作为独立的

个体可以直接面对上帝。

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中,青年学者同样展开了变革历史的思想接力赛,用牛顿的话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洛克年轻时崇拜笛卡尔、霍布斯,伏尔泰赞美培根、洛克、牛顿以至于到了对他们折服的程度,卢梭自己也承认受益于洛克。狄德罗和爱尔维修年轻时都受过伏尔泰的亲自指导,而康德在大学期间就沉浸于卢梭的著作之中,在康德的学生中歌德与席勒是佼佼者。每一代人都是在青春期就向前辈学习,接过思想接力棒进行创新,有了不同见解,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推动了思想革命。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主张“神”的存在至高无上,启蒙思想家将人的认识与宗教信仰分开,理性与主体性成为替代上帝的价值之源。有“近代哲学之父”美称的笛卡尔以理性和自我意识作为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启蒙运动最后的思想家康德也以自我意识作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轴心。哲学家倪梁康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经历了漫长的沉睡和艰难的苏醒之后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状态之中,这个状态是所有思想努力的出发点和前提<sup>[15]</sup>。

康德对何谓启蒙作了著名的答复: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如何理解不成熟状态是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历史说明,父权制增长了财富、创造了文明,但是又实施专制统治与愚民政策,启蒙的批判就是针对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提出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等一系列观点。启蒙者的著作、文章被商人兜售到乡下,各种培训中心、读书俱乐部、学者协会风起云涌,使启蒙走向社会开启民智,通过社会推动变革,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且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创建合众国的那一代美国人——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登——都是启蒙运动的后继人。……凡是读过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及其‘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人的自然权力’以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的辩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sup>[16]</sup>杰斐逊26岁当选为议员,33岁时起草了独立宣言。

在上述三次伟大变革中,一代又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继承前辈的思想,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思想接力。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亲密师生关系,名垂青史。但是,像这样在几个世纪的长时期中形成如此连贯的师生群体,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他们在接力中创建了伟大的思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对青年历史价值的最经典的说明,也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压抑后青春化对父权制的有力冲击,是人性善与恶的较量,谱写了青年历史存在的最新篇章,值得在青年的历史上大书特书。

#### 四、后现代与新价值观

青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演化,历史也促进了青年人性的提升,青年与历史的合力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入20世纪,青年与历史发生了空前的碰撞,源于欧洲的两世界大战,是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杀戮与蹂躏的滔天大罪,特别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青年既是制造这个滔天大罪的工具,又是进行反战、发扬人文精神的力量。

这个滔天大罪正好发生在人文主义思潮空前活跃的时间与地点,这是为什么?从17-18世纪的一百余年中,欧洲各国在海外进行殖民地争夺,在本土则争夺政权与土地,形成列强战争的新形势,19世纪战争不断,著名的就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历史学家认为,欧洲20世纪的上半叶是19世纪的继续。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建立了新的生活,他深感欧洲旧制度之“旧”,根子全在于社会的不平等和旧贵族势力的盘根错节。

长达千年之久热衷于战争的历史惯性,必然会由统治者将其神秘的精神植入青年的心灵之

中以维持旧制度之“旧”。德国 1911 年成立了“青年德意志联盟”，英国 1908 年发起了少年童子军运动。斯特龙伯格在谈到战争的思想根源时写道：“研究 1914 年思想氛围的人都知道，一种奇异的神秘精神可以解释人们为何多年忍受痛苦而大力支持这场战争；这种精神主要存在于青年人当中，在那带有诗人气质的青年人、理想主义者和不安分的年轻人中。”<sup>[17]</sup>书中举了青年慷慨赴难的事例，而反战者属于极少数。其实，学术界曾接连举行会议为挽救欧洲的命运而呐喊，许多地方组织了反战团体，其中就有青年，最有代表性的是 20 岁出头的理查德到处奔走，倡导“泛欧运动”。在学术界、政治家和青年的共同努力下，西欧终于实现了一体化，敌国成了盟国，仇人成了朋友，而且从殖民地撤退，结束了战乱不已的历史。20 世纪的下半叶，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促进了全球化。有意义的是，60 年代青年大学生竟然成了高举自由、人权、和平的革命大旗、代表文明一方的主角，反战是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留下了环境保护、种族和男女平等、社会公正等许多关乎人类文明进程、关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生意义的问题。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化，其理论能量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内在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被认为进入了后现代。启蒙高举理性的大旗，但是理性与主体性的自我膨胀将人视为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追求极端物质享受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导游戏规则，民主沦为寡头政治，鼓励自私与贪婪，继续暴力与战争，加速了对地球的破坏，构成对人类生命不可抗拒的威胁，科学家纷纷发出迫在眉睫的警告。与 20 世纪不同，21 世纪面临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精神危机。

青年继续担当了创造历史的使命，一个新的价值观在青年中诞生了。1981 年、1990 年两次世界范围的价值观调查，密执根大学殷格哈特教授负责欧洲的调查，调查结论是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青年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他认为，这是代际更替的结果，出生在二战后经济发展时期的一代形成了有别于老一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终将带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sup>[18]</sup>。墨菲 (Murphy) 指出，从环境破坏的恶果最终由谁承担的长远现实来看，年轻人才是环境破坏的相对受害者，所以对环境保护比长辈更加积极。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巴特尔 (Buttel) 指出，在西方环境运动中，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表现出高涨的热情，构成了绝对的参与主体<sup>[19]</sup>。殷格哈特所开展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调查也证明这是事实。

超出生存需要的物质享受，在人类能够创造出更广义的生活资料时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年轻人要将物质享受放在“后”面，岂不是要改变人类的历史吗？这正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价值所在。战争就是从人类争夺生存资料开始的，超过生存需要的物质享受更是历史上一直引发战争的起因。人类不仅要享受物质更要享受精神，这是减少国际纠纷的主要途径，是从物对人的统治转变为人对物的统治，从对物的依赖性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一步。马克思就曾将人类对抗性的发展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都赞赏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说法：“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sup>[20]</sup>《古代社会》发行后的一百年，青年奉行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了进入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切入点。

在人类史前时期性别与年龄的关系比较和谐的时候，青春化融入成年社会成为一种人类学现象。父权制产生后，一部分成年人压制其曾融入的妇女与青少年文化，以战争、暴力、镇压维护其统治，青年对这种人性失落进行的反抗以悲剧告终；另一部分成年人宣扬人性理论，制定道德规范，得到青年拥护；还有一部分青年则纳入成年社会成为战争的工具。当父权日益分散，青

年有了发展空间,摆脱了依附性冒险经商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要求获得权力与地位,一代又一代青年在维护人性的成年人的影响下,学习古典著作,兴起了思想的接力,促进了工业革命和民主制度形成,青年成了重要的社会力量,再次以青春化冲击父权制。当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不但战争、暴力、恐怖仍然接连不断,而且由于贪婪的物质享受不惜代价地掠夺地球资源,地球自己都感到生存危机并开始进行报复,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青年最早奉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不是完全放弃物质,而是提倡简朴生活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注重享受生活质量,并参与推动社会进步。青年们轻物质重精神、反战争求和平的悄悄的革命正在全球蔓延,希望有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世界。从人类诞生开始,代际关系及其冲突贯穿了人类整个历史,世代交替是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建构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理安·艾斯勒根据两性关系,对人类历史从母权制的伙伴关系到父权制的统治关系转变,以及如何用新的伙伴关系模式取代依赖暴力的统治关系模式、创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作了全面论证。艾斯勒为此写了《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等三本巨著,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20位思想家之一。年龄和性别是构建人类社会最基本、最自然的社会关系的两大要素。青年在人类历史以及面向未来中的重要性与妇女相等,青年与妇女相互携手,共同努力,将妇女文化与青少年文化再次同时融入成人社会,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更美满。如果像艾斯勒那样将代际关系放在人类历史的全景中加以详尽论述,也许能成为21世纪的思想家。笔者以一个年迈长者的情怀寄希望于我国青年研究学者,能够在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中,做出像艾斯勒那样的贡献!

#### [ 参 考 文 献 ]

- [1]田 杰:《青年研究的史学范式与理论图景》,载《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
- [2]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 吴新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 [3][4][5]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46、56-57页。
- [6][7]德日进:《人的现象》,李弘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06页。
- [8]约翰·C·埃克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潘 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39页。
- [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 [10]安继民 刘国建:《绿色世界的构思——青年学描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 [11]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席玉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 [12]杨 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 [13]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页。
- [14]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 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0页。
- [15]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绪论第39页。
- [16]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0-121页。
- [17]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 赵国新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 [18]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 冯 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 [19]洪大用 范叶超等:《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分析》,载《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
- [20]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杨东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6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